

華中國學

张勇诗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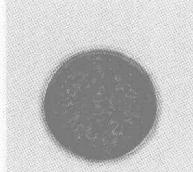
主 编◎罗家祥

2015年·秋之卷（总第五卷）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国学研究丛书

華中國學

张勇书



主 编 © 罗家祥

2015年·秋之卷¹⁰⁰ (总第~~五~~卷)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主持编辑的大型学术集刊,内容包括政治史、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社会史、古文字学及古典文学等国学研究的各个分支,涵盖了历史学、文学、哲学、语言学等四个学科,集中展现了海内外国学研究的部分最新学术成果。所选文章多立足学术前沿,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和新方法的运用,展现新视角、发明新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国学研究领域的先进水平。

本书主要面向科学研究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也适用于广大文史爱好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中国学. 2015 年. 秋之卷: 总第 5 卷/罗家祥主编.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 10
(国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680-1352-9

I. ①华… II. ①罗… III. ①国学-文集 IV. ①Z126.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3274 号

华中国学 2015 年·秋之卷(总第五卷)

罗家祥 主编

Huazhong Guoxue 2015 Nian · Qiu Zhi Juan

策划编辑: 周小方 钱 坤

责任编辑: 刘 烨

封面设计: 原色设计

责任校对: 祝 菲

责任监印: 周治超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81321913

录 排: 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 武汉鑫昶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25 插页: 2

字 数: 459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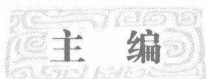
国学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天瑜 邢福义 朱 雷 刘献君 杨叔子 张岂之
张勇传 韩忠学 宗福邦 葛剑雄



罗家祥



程邦雄 雷家宏 李耀南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兆鹏 邓小南 华学诚 刘真伦 李传印 杨 果
吴根友 冻国栋 张三夕 赵国华 郭齐勇 黄朴民
黄树先 阎步克 董恩林



夏增民



总序

General preface

近 30 年来,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举世震惊的经济成就,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巨大进步,飞速发展的国力提升,迎来了史诗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也为实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伟大复兴与飞跃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神州大地蔚为大观的“国学热”,正是在这一宏伟的背景下出现的。

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之所以重新得到如此热烈的关注,原因就在于其本身具有不可估量的独特价值。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世界上唯有古老的中华文明经过数千年风雨坎坷,非但没有消亡,而且从未中断,成为当今世界人类共同珍视的宝贵财富和智慧源泉,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之所以如此,传统中华文化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中华文化又具有哪些独特价值?以中华原典中最具代表性的《老子》和《论语》为例,虽然它们具有的价值取向似乎有所不同,即所谓出世与入世,但却有着共同内核,这就是“和”的理念。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这一理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过积极的作用;而当代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老子》和《论语》无疑也是最重要的本土的思想宝库。中华文化向来注重以人为本的“天人合一”,强调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自然一体;讲究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时遵循“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和“守弱居柔”的规律;信守中庸之道,深怀忧患意识以及“不争”与“无为”,“不争”即“天下莫能与之争”的“不争”,“无为”即“无所不为”的“无为”,这些文化特质所表现出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都是中华文化贡献给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生物得到稳定的延续靠的是基因的遗传,又靠基因的变异得到发展,而人类社会的“基因”则是文化。文化本质上就是人化,即以文化人,以人化物。过去留下的东西就是文化,这里既包括有形的,又包括无形的,人类社会就是靠文化的传承才得以延续,又靠文化的创新才得以进步。民族文化是民族的基因。中华文化所凝现的民族精神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哲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一直产生着巨大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如今,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雄姿迈入 21 世纪,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显得尤为迫切。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是中华民族根基。因为一个民族的特性不取决于遗传的自然基因,而是取决于人文文化,只有人文文化才能彰显一个民族的身份。如果一个民族遗弃了自己固有的文化,丢失了自己的传统,那将只是一个种族,不能称之为民族。在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高速发展和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先进科学,没有现代技术,就会落后,一打就垮,痛苦地受人宰割;然而,没有民族文化,没有人文精神,就会空虚和异化,则会不打自垮,甘愿受人奴役。因此,没有科学技术进步就绝没有社会进步,但只有科学技术进步,那这个社会就是很危险的;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很落后,这个社会也是很野蛮落后的;如果一个社会科学技术很进步,而精神文明非常落后,这个社会将是灾难性的。毫无疑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人文文化是第一生产力的动力源、方向盘。中华民族要全面而迅速地实现伟大复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固有的人文与传统,其意义不言而喻。

人们可能要问,在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否能与现代社会兼容?中外无数事例表明,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人文精神和智慧不仅不会与现代社会产生冲突,而且还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奇特的效果,即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传统文化也可发挥出巨大作用。日本明治维新后,有一位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一生创办了 500 多家企业,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金融之王,他 80 多岁退下来之后,在日本财团开办的讲习班上专门讲他如何用《论语》来办企业,堪称毕生将中华文化、《论语》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完美结合的典范,也是中华原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巨大作用的经典案例。直至今日,他的五世孙、日本著名的投资者涩泽健还在强调他的哲学名言:“商业的发展必须以社会伦理为根基,否则会把人引入歧途。企业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给社会创造财富。”这是利与义多么紧密的结合。此外,我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以及其他东方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说明,古老的中华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完全可以做到既背靠五千年历史文化,又坚持三个面向。

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中华民族要形成强大的竞争力,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更大的作为,就必须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而要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拥有大量的创新型人才和健全而良好的国民素质就是最基本的前提。在这方面,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认为,人文对科学至少有三大作用。首先,人文为科学发展指引方向。科学求真,但科学不能保证其方向完全正确。无数的事例证明,20 世纪科技的高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严重负面影响。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科学需要人文导向,人文的提升当然也需要以科学为基础。其次,人文为科学提供了动力。事实证明,只有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进行完美的结合,才能结出符合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之果。在我国近代化进程中,这样的范例不胜枚举。20 世纪享誉中外的我国老一辈科学巨子如华罗庚、苏步

青、茅以升、李国平等以及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丘成桐等在国学方面均有极高的素养，这不仅深刻影响着其人格风貌、精神境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们在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功；而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则将其在物理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直接归因于国学大师胡适。第三，人文为科学开辟原创性源泉。科学讲逻辑，讲分析、解决问题，但科学中最重要的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就需要直觉和灵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直觉、灵感、想象力从哪里来？科学教育固然有其重要的一面，但更多则来自于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可以培养出高尚的人性和高级的灵性，科学创造是离不开人的人文素养的。因此，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应该占有重要地位。

从处于转型过程中的我国社会现实需要看，通过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建设当代文化、构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已刻不容缓。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近 20 年来在不同场合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强调中华民族文化对创新的重要性，如在 2006 年 1 月，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谈到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关系时，深刻阐明了中华文化与创新的关系，提到中华文化含有丰富的创新内容，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006 年 11 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文联、作协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每一次飞跃、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烙印。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中华文化对增强民族创造力、自信心和凝聚力，对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

我国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纵深发展，社会上许多十分严重的隐忧与显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显得极为重要和空前迫切，而中华文化中的许多精华养分则是亟待继承、弘扬的。举例来说，我国几千年来强调信守仁、义、礼、智、信，显然是可以纳入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予以继承和弘扬的。所谓“大忠大爱是为仁，大孝大勇是为义，修齐治平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对当前的诚信建设与道德建设显然特别有着无可置疑的积极意义。何况，通过弘扬优秀中华文化，陶冶国民感情，启迪国民智慧，提升国民素质，增强国民的凝聚力与创造力，其意义非同一般。

以上所讲只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与感受。当然，挖掘几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并使之产生积极影响，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与共同努力，需要大批专业工作者扎扎实实的辛勤耕耘。同 20 世纪初比，当代意义上的国学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指中华传统文化本身，而且还应包含近代以来借鉴西方学术、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也需要本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博大的胸襟、更深远的抱负，肩负起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责任和使命，为当代我国的文化建设付出更多的努力。

近 10 年来，我校国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已成为

一道亮丽的学术景观；2009年4月，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宣告成立，本学科的发展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值此凝聚着大家心血的《华中国学》问世之际，谨致衷心的祝贺，更寄以深厚的期望！

最后应声明一点，我只是一名工科教师，由于种种原因，介入了国学研究之内，然而毕竟大非内行，所讲的不对之处，希望读者特别是本领域专家批评指正，我不胜感谢。

是为序。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杨殿珪

二〇一二年九月一日



前言

Preface

华中科技大学于 2008 年正式发文成立国学研究院后，所有同仁便有一心愿，即编辑出版国学辑刊，使之成为反映国学研究成果的园地。最初的想法是分门别类，逐年一辑。于是，2008 年岁尾，国学研究院即组建国学辑刊编辑委员会，出版过一部主要反映我校历史学研究成果的集子，冠之以“中国历史文化论集——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辑刊第一辑”，由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后来经过多次商议，编委会调整了原有思路，遂将辑刊改名为“华中国学”，自 2015 年起，每年春秋各出一卷，为半年刊，篇幅在 20 万字左右；在内容方面，除我校同仁的论文之外，也适当吸纳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收录在这本集子的论文，鉴于目前学界对“国学”一词内涵和外延的诠释见仁见智，故未按经、史、子、集研究予以分类，也未按时下通行的学科领域进行处理，而是根据诸位同仁的学术专长、根据此次所辑论文的内容进行了大致的划分。若干篇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因系本校历史所教师劳作的产物，也一并收录。这些成果中有些已在相关刊物上发表，有的则是作者提供的近作。如果这些作品能得到学界各位师友、各位同仁的关注、批评与指正，将不胜欣慰与荣幸！

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到《华中国学》的编辑出版，我们要深深感谢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学界前辈、学校领导和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对人文学科的关心、爱护、支持与扶持。我校国学研究院成立庆典举行于 2009 年 4 月 11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叔子先生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为参加这一活动，退掉原先订好的返程机票，重新订票，赶回学校时已是凌晨，并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做了主题讲话；校党委书记路钢教授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参加成立大会并发表高屋建瓴、热情洋溢的致辞；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教授因 11 日要赴京参加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遴选，于 10 日专门打电话到我家中对国学研究院成立表示祝贺，并对他不能与会表示歉意；原校党委副书记、对我校文科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刘献君教授更是全程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教授，原西北大学校长、哲学家、历史学家张岂之教

授，复旦大学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家朱雷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家萧汉明教授，武汉大学语言学家宗福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家邢福义教授，历史学家熊铁基教授等近 70 名著名专家学者或发来贺信，或莅临大会发表重要演讲；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水电能源学家张勇传先生则欣然为国学研究院题写了院名。没有他们各种形式的关心与支持，我校人文学科是不可能发展到如今这一局面的。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位德高望重、具有非凡人格力量的学界前辈，一位深具战略眼光和充满人文情怀的教育家，一位一辈子并不以人文学科为工作对象但又时时刻刻对人文学科念兹在兹、一往情深的卓越科学家，这就是前文已经提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杨先生毕生耕耘于机械工程领域，在同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交叉研究中，特别是先进制造技术、设备诊断、信号处理、无损检测新技术、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的应用等方面均有独创性的贡献，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居功甚伟，1991 年获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但是，他对人文学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始终倾注了满腔的热忱，真正是不遗余力地以各种形式予以关心和支持。除前述参加国学院成立大会的感人事迹外，杨先生为本辑刊的出版所展现的人格风范、人文情怀与高尚情操更使我们增添了难以言表的感戴之情。卷首这篇 3500 字的“总序”是杨先生在抱病卧床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完成的，其间数易其稿，初稿及二稿上到处是密密麻麻的改动文字。须知，先生已是 81 岁的老人，且此类不情之请不仅不是他应做的工作，也为撰写“总序”时的健康状态所不容许，是完全可以避开的。先生独特的人格风范、宽广无私的胸襟、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满腔热情和古道热肠实在是摄人心魄，令人永远难以忘怀！

《华中国学》得以顺利出版，还得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姜新祺先生，以及策划编辑周小方女士和钱坤先生，没有他（她）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热爱以及注重发展本校人文学科的情怀，这套辑刊纳入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并如期问世，是不可能的。此外，辑刊的执行主编、历史研究所夏增民博士在论文整理归类、规范体例、编辑文本以及联系出版事宜等诸多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谨此一并致谢。

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罗家祥

二〇一二年九月三日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修订



目录 Contents

【专题研究】

唐人选唐文辑考····· 刘真伦 (1)

【论文】

兵学思想史研究中的“瓶颈”及其突破····· 黄朴民 (83)

汉代律令初探——以武帝时期戾太子事件为中心····· 白 杨 (91)

杜佑军事思想初探····· 尤学工 (101)

“防患于未然”——北宋士大夫的政治战略观探微····· 刘大明 (109)

宋徽宗时的道士和道官群····· 王曾瑜 (123)

国学经典：明神宗经筵日讲课程考····· 谢贵安 (137)

孔子天命观述论····· 赵建功 (153)

朱熹“《易》本卜筮之书”析论····· 唐 琳 (167)

慧琳添修之《妙法莲花经音义》脱字校正····· 黄仁瑄 (179)

汉语依凭介词的语义范畴····· 何洪峰 张文颖 (191)

东西碰撞下的家训与传统经典教育

——以周馥《负暄闲语》为中心····· 陈 丹 (205)

卢作孚对战后中国的建设主张

——以《论中国战后建设》一文为中心的考察····· 李 琼 (215)

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先师王瑞明教授····· 罗家祥 (221)

唐人选唐文辑考

华中科技大学 刘真伦

本文钩辑宋元以前诸家书目所著录的唐人选唐文^①种，其中诗文选本^②种、诏敕选本^③种、奏议章疏选本^④种、策论判词选本^⑤种、辞赋选本^⑥种、唐代类书^⑦种，以展示有唐三百年文章创作潮流的动态轨迹。同时，这批选本保存了不少唐文原始文本，可以为唐文的现代整理提供重要的辑佚线索和校勘依据；尚有传本的少量选本序跋，可以为唐代文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不少新史料。唐人选唐文的文献价值及其理论价值，还存在进一步发掘、研究的广阔空间。

从接受与传播的角度考量,选本可以被视为一代学术文化的风向标。在当代学术研究的领域内,有关唐人选唐诗的研究,无论在文献方面还是理论方面,都已经成就斐然。相形之下,有关唐人选唐文的研究,却一直较为沉寂:迄今为止,严格意义上的唐人选唐文辑本,除了拙著《昌黎文录辑校》之外^①,似乎还并不多见;有关唐人选唐文的专题论文,似乎也寥寥可数。实际上,唐代的文章选本数量甚多,尚待研究的问题也还不少。本文钩辑宋元以前诸家书目所著录的唐人选唐文94种,其中诗文选本17种、诏敕选本35种、奏议章疏选本24种、策论判词选本9种、辞赋选本9种。此外,选取性质相近的唐代类书46种作为附录^②。上述的选本绝大多数都已经失传,残存的遗文也极为有限。但仅就现存遗文考察,其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都不容小觑,今简述如次。

在文学史研究方面,这批选本的书名本身就足以展示有唐三百年文章创作潮流的动态轨迹。笔者一向认为:人类的全部知识可以区分为三大门类:自然科学关注客观物质世界,社会科学关注人类社会,人文科学则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与此相对应,文学观念也可以区分为三大系统:原道的文学观,其着眼点在人文与自然的关系;言志的文学观,其着眼点在人文与社会的关系;缘情的文学观,其着眼点在人文与自我的关系。唐代文章创作的发展正好以文学观念的转移为标志区分为这样的三个阶段:初盛唐流行原道的文学观,“原道”所“原”为自然之道,以天地自然作为文学的本体、创作的源泉,注重对自然的描模、感悟,对真善美的追求侧重于“真”,强调文学的“再现”功能,其批评理论侧重于形式主义批评;盛中唐流行言志的文学观,“言志”所“言”既包括经世济民之志,也包括忧国忧民之志,以社会生活作为文学的本体、创作的源泉,注重对社会生活的美、刺,也就是歌功颂德与批判针砭,对真善美的追求侧重于“善”,强调文学的“反映”功能,其批评理论侧重于社会文化批评。中晚唐流行缘情的文学观,“缘情”所“缘”的是个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以内在情性作为文学的本体、创作的源泉,注重自我意识与自由意志、独特个性与独立人格的张扬,对真善美的追求侧重于“美”,强调文学的“表现”功能,其批评理论侧重于审美心理批评。与此相对应,不同时期的文章选本正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创作潮流:初唐时期的《芳林要览》、《文馆词林》、《丽正文苑》、《词苑丽则》、《海藏连珠》等,足以昭示这一时期文章图形写貌、模山范水的典丽倾向;盛唐以下的《贞观政要》、《唐名臣奏》、《明皇制诏录》、《贞元制敕书奏》、《元和制集》等,都宣示了这一时期文章经世济民的追求;中唐时期文风大变,赵德《昌黎文录》、李吉甫《古今文集略》,就是古文运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明确标志^③。

在文献研究方面,这批选本保存了不少唐文原始文本,可供辑录,亦可供校勘考订。宋人编纂唐文总集,从中取资不少。《文苑英华》采用“编制”30篇、“类表”127篇、“王言会最”6篇、“玉堂遗范”16篇,就是明证。就文献校勘而言,周必大、彭叔夏录存了上述诸书的大量异文,其校勘价值不言而喻。在文章作者的考订方面,这批选本的价值

①《昌黎文录辑校》利用现存的十二个珍贵的宋代韩文传本,钩辑出韩门弟子赵德选编的韩文选集《昌黎文录》七十二篇中的六十四篇,并利用现存宋元文献对其文字进行了综合校理,该书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②本文所说的唐代,按史学界的惯例,包括了五代时期的54年。本文考察的有关著述,凡收录时代明确限定在唐以前者,凡收录对象明确限定为经史或诗歌者,均不予考虑。此外的著述中,凡未见遗文传世,难以确定是否收录有唐代文章的佚著,本文仍然纳入考察范围,以便为进一步的稽考提供线索。

③参见拙文《唐文三变:文学本体观念的演变与唐代散文创作风尚的变迁——兼论文学革命的结构》,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也不可忽视。《文苑英华辨证》卷五考《为文武百官请复尊号六表》作者云：“《为文武百官请复尊号六表》载柳宗元集中，而《唐类表》作‘崔元翰’，《文苑》总目作‘类表’而本卷乃作‘常袞’。按唐德宗兴元元年幸奉天，削去徽号。贞元五年六月百官请复旧，即此六表是也。是时崔元翰为礼部员外郎历知制诰，《唐书》称其诏令温雅，则《类表》云元翰作是矣。况又《总目》明言取之《类表》乎？本卷乃误作‘常袞’。袞于建中初卒，至是已十年矣。又柳文收此表，或入正集，或入外集。按《宗元年谱》，贞元五年方十七岁，八年始贡京师，其误可知。”^①又考《贺赦表六首》作者云：“《类表》以为李吉甫作，而《文苑》以为李邕。按：邕天宝初卒，而此六表乃作代宗、德宗、宪宗时，况《文苑》于五百五十九卷有重出一表，题云李吉甫乎？又第二表末云：‘谨遣当州军事衙前虞侯王国清奉表陈贺以闻’，正与吉甫《郴州谢上表》末语同，则非邕作也。”又考《中书门下贺赦表》作者云：“《类表》以为令狐楚作，而《文苑》以为独孤及。按此表载宪宗尊号，乃元和中也。及以代宗大历十二年卒，决非及所作明矣。”又考《乞朝觐表》作者云：“《类表》以为柳冕作，而《文苑》以为李俛。按《唐书·柳冕传》亦载此表，决非俛所作也。”^②对当代学术研究而言，这批选本残存的遗文可以为唐文的现代整理提供重要的辑佚线索和校勘依据，有待发掘的文献价值还非常丰富。

在理论研究方面，尚有传本的少量选本序跋，如《贞观政要序》、《文思博要序》、《兔园册府序》、《记室备要序》等，可以为唐代文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不少新史料。比如成书于贞观十五年的高士廉《文思博要序》，体现的是初唐以前的文学观念：“自非总质文而分其流，混古今而共其辙，则万物虽众，可以同类，千里虽遥，可以同声。然则魏之《皇鉴》，登巨川之滥觞；梁之《遍略》，标崇山之增构。岁月滋多，论次逾广。《类苑》、《耕录》，齐玉珙而并驰；《要略》、《御览》，扬金镳而继路。”^③其对魏晋文学正面评价的态度，非常值得注意。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成书于显庆年间的杜嗣先《兔园策府序》。该序对魏晋齐梁文学持明确的批判态度：“自魏晋之后，藻丽渐繁；齐梁以还，文华竞轶。”他指责齐梁文风：“构虚词而饰巧，穷异辩以邀能，文皆理外之言，理失文中之意。将陈正道，掩巢燧于毫端；欲叙升平，摈唐虞于字末。境才臻于九服，远述幽冥之荒；德未静于一戎，先动云雷之气。奏谀言而窃位，假繁论以丰词，匪穷理之大猷，乖得贤之雅训。”^④其高扬“巢燧”、“唐虞”的复古主义文学主张，更值得加以特别的注意。成书于开元八九年间的吴兢《贞观政要序》，则体现了盛唐时期的文学观念：其选录原则是“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其品评标准是“词兼质文，义在惩劝”，所关心的是“人伦之纪”、“军国之政”^⑤。其所褒扬的，是“委质策名，立功树德，正词鲠义，志在匡君”^⑥。以政治教化作为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与张说《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先天醮宴序》、颜真卿《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逖文公集序》、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梁肃《秘书

① 李昉等：《文苑英华》卷末附录《文苑英华辨证》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南宋宁宗嘉泰四年刊刻配明嘉靖四十五年重刻本，第8叶上。

② 李昉等：《文苑英华》卷末附录《文苑英华辨证》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8叶上，第9叶下。

③ 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六九九，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5叶上。

④ 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版，第62页。

⑤ 吴兢：《贞观政要》卷首，四部丛刊本。

⑥ 吴兢：《上贞观政要表》，《全唐文》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3023页。

监包府君集序》、杨绾《条奏贡举疏》、白居易《与元九书》等如出一辙。至于赵德《昌黎文录序》，则高高举起了道统的旗帜：“所履之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轲、扬雄所授受服行之实也，固已不杂其传。由佛及聃、庄、杨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所追求的，是“光于今、大于后，金石燹铄，斯文粲然，德、行、道、学、文庶几乎古”的境界^①。《昌黎文录》的问世，标志着以弘扬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由、追求独创为特征的韩、柳古文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昌黎文录序》则无异于中唐古文革新运动的一篇宣言书。上述的几篇序文，迄今为止流行的若干部《批评史》、《散文史》都还很少有人采用。从这一意义上讲，唐人选唐文的理论价值，也还有待于当代学术界的重视与发掘。

以下分类稽考宋元以前诸家书目所著录的唐代文章选本。

一 文章总集

宋王应麟《玉海·艺文·总集文章》“唐七十五家总集”条：“刘允济《金门待诏集》、许敬宗《文馆词林》、《丽正文苑》、《芳林要览》之类，皆集文也。”^②实际上，许敬宗《文馆词林》就诗文兼收，并非单纯的文章总集，其余诸集也大都如此。本文钩稽的原则是：除单纯的诗歌总集之外，凡诗文兼收的诗文总集均纳入视野。此类选本，共17部。

1. 芳林要览三百卷(佚)

《旧唐书·经籍志下·总集》：“《芳林要览》三百卷，许敬宗撰。”^③《新唐书·艺文志·总集》：“《芳林要览》三百卷，许敬宗、顾胤、许圜师、上官仪、杨思俭、孟利贞、姚璿、窦德玄、郭瑜、董思恭、元思敬集。”^④宋郑樵《通志·艺文略第八·总集》著录同《旧唐书》^⑤，《玉海·艺文·总集文章》据《新唐书》著录。

该书未见遗文传世，其编次不得而知。其具体修撰时间不详，据《旧唐书·元思敬传》：“元思敬者，总章中为协律郎，预修《芳林要览》。”^⑥似修撰于高宗总章年间。但修撰者中，董思恭被贬于龙朔三年(662)，上官仪卒于麟德元年，顾胤、窦德玄则卒于乾封年间。据此推考，该书修撰时间，应在龙朔、总章之间。《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以及宋元诸藏书目均未著录此书，似北宋年间该书即已失传。《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志》)录存其作者名氏，是据原书逐录抑或据其他史料转录，不能肯定。《通志》、《玉海》应出转录^⑦。

今稽考该书编纂者生平于次：

许敬宗，两“唐书”有传，其生平如次：敬宗，杭州新城人。幼善属文，举秀才，授淮阳郡司法书佐，俄直谒者台，奏通事舍人事。隋末为李密元帅府记室，与魏征同为

① 《韩文公志》卷三，文浣《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宋蜀刻本，第1叶上。

② 本文所引宋王应麟《玉海·艺文·书目》，均出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下不再出注。

③ 本文所引后晋刘昫《旧唐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本，此下不再出注。

④ 本文所引宋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本，此下不再出注。

⑤ 本文所引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均出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下不再出注。

⑥ 刘昫：《旧唐书》卷一九〇上，第4997页。

⑦ 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五著录《芳林要览》三百卷。不过该书大多辗转抄撮，并非据藏书实录。凡《国史经籍志》所记，本文概不采用，此下不再出注。

管记。武德初，召补秦府学士。贞观八年，累除著作郎兼修国史，迁中书舍人。十年，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马。累迁给事中兼修国史。十七年，以修武德贞观实录成，封高阳县男，权检校黄门侍郎，迁太子右庶子。十九年，皇太子定州监国，敬宗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中书令岑文本卒，于行所召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二十一年，加银青光禄大夫。二十三年五月庚午，自检校吏部尚书太子左庶子兼礼部尚书。永徽初左授郑州刺史。三年，入为卫尉卿，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六年，复拜礼部尚书。显庆元年，加太子宾客，二年八月辛未，册拜侍中，监修国史(《新唐书·高宗纪》)。三年，进封郡公。十一月戊子，权检校中书令，戊戌，为中书令(《新唐书·高宗纪》)。龙朔二年，改右相，加光禄大夫。三年八月壬寅，册拜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并依旧监修国史(《新唐书·高宗纪》)。乾封初，以敬宗年老不能行步，特令与司空李绩每朝日各乘小马入禁门至内省。自贞观以来，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晋书》、《东殿新书》、《西域图志》、《文思博要》、《文馆词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录》、《新礼》，皆总知其事。咸亨元年三月壬辰致仕(《新唐书·高宗纪》)，仍加特进，俸禄如旧。三年薨，年八十一。

顾胤，两“唐书”有传，其生平如次：胤，苏州吴县人。贞观十二年，以秘书郎预修《括地志》(《旧唐书·濮王泰传》)。永徽中迁起居郎，兼修国史。撰《太宗实录》二十卷成，加朝散大夫，授弘文馆学士。撰《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八十卷成，加朝请大夫，封余杭县男。显庆中为著作郎，预修贞观二十三年以后至显庆三年实录，四年二月五日，加谏议大夫(《唐会要》卷六三)。龙朔初为崇贤馆学士，预修《瑶山玉彩》(《旧唐书·孟利贞传》)。三年，迁司文郎中。卒于乾封二年(667)三月之前(《金石录》卷四《唐弘文馆学士顾君墓志》)。

许圉师，两“唐书”有传，其生平如次：圉师，本高阳人，梁末徙于周，因家于安陆。举进士，累迁给事中，显庆二年闰正月为御史中丞(《唐会要》卷二七)。显庆三年为黄门侍郎(《旧唐书·礼仪志一》)，四年四月乙丑，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五月己卯，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一月丙午，为左散骑常侍检校侍中(《新唐书·高宗纪》)。三年，以修实录功，封平恩县男。龙朔元年，为侍中兼太子右庶子(《旧唐书·孝敬皇帝弘传》)。龙朔二年五月丙申，自左侍极为左相。十一月辛未下狱，十二月辛丑罢相，三年二月，左迁虔州刺史(《旧唐书·高宗纪上》)。乾封元年为相州刺史(《册府元龟》卷一五五)。上元二年八月庚子，自左丞迁户部尚书，仪凤四年正月辛未卒(《旧唐书·高宗纪下》)。

上官仪，两“唐书”有传，其生平如次：仪字游韶，本陕州陕人，父弘，隋江都宫副监，因家于江都。大业末弘为将军陈棱所杀，仪时幼，藏匿获免，因私度为沙门。贞观初擢进士第，太宗闻其名，召授弘文馆直学士，累迁秘书郎。预撰《晋书》成，转起居郎。高宗嗣位，迁秘书少监。龙朔二年，加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十月庚戌，同东西台三品，兼弘文馆学士如故。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狱，十二月丙戌被杀(《旧唐书·高宗纪上》)。

杨思俭，两“唐书”无传，今钩稽其生平如次：龙朔元年为太子中舍人，预修《瑶山玉彩》(《旧唐书·孝敬皇帝弘传》)。咸亨间为司卫少卿(《旧唐书·武承嗣传》)。

孟利贞，“旧唐书”有传，其生平如次：利贞，华州华阴人。中宗在东宫，为太子司议郎。龙朔元年与少师许敬宗、崇贤馆学士郭瑜、顾胤、董思恭等撰《瑶山玉彩》五百卷，龙朔二年奏上之。累转著作郎，加弘文馆学士，垂拱初卒。有《续文选》十三卷。

姚璿，两“唐书”有传，其生平如次：璿字令璋，雍州万年人。永徽中明经擢第，累补太子宫门郎，与司议郎孟利贞等奉令撰《瑶山玉彩》，书成，迁秘书郎。调露中累迁至中书舍人，封吴兴县男。则天临朝，迁夏官侍郎。坐从父弟敬节同徐敬业之乱，贬定州刺史、广州刺史、桂州都督府长史(《金石录》卷二五《唐工部尚书姚璿碑跋尾》)。召拜天官侍郎，如意元年七月戊寅，迁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资治通鉴》卷二五〇)。是岁九月辛丑，坐事转司宾少卿，罢知政事。延载元年八月己巳，擢拜纳言、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证圣初，加秋官尚书。武后封嵩山，总知仪注，为封禅副使。更造明堂，又以使护作，加银青光禄大夫。万岁登封元年七月辛亥，为榆关道安抚副大使，二年八月丙戌，罢相(《新唐书·则天顺圣皇后纪》)，左授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旧唐书·则天皇后纪》)。拜地官尚书，岁余，转冬官尚书，仍西京留守。长安中致仕，进爵为伯。神龙元年卒，年七十四。

窦德玄，两“唐书”有传，其生平如次：德玄，岐州平陆人。隋大业中起家国学生，始为高祖丞相府千牛，历太宗时不甚显。高宗以旧臣，自殿中少监为御史大夫，摄吏部、礼部、度支三尚书(《金石录》卷二四《唐司元太常伯窦德玄碑跋尾》)。龙朔二年五月丙申，自大司宪为司元太常伯(《册府元龟》卷六九)。麟德元年八月戊子，以大司宪兼司元太常伯，检校左相(《旧唐书·高宗纪上》)，封钜鹿男。卒于乾封元年十一月之前(《金石录》卷四《唐司元太常伯窦德玄碑》)，年六十九。

郭瑜，两“唐书”无传，今钩稽其生平如次：显庆元年，以太子洗马助玄奘译经(《旧唐书·玄奘传》)。龙朔初为崇贤馆学士，预修《瑶山玉彩》(《旧唐书·崔行功传》)。龙朔二年五月为司更大夫，授《春秋左氏传》于太子李弘(《册府元龟》卷二六〇)。

董思恭，《旧唐书》有传，其生平如次：思恭，苏州吴人。历中书舍人(《新唐书·杜正伦传》)、崇贤馆学士(《旧唐书·孟利贞传》)。龙朔三年，以右史知考功贡举事。四月壬辰，预策策问受赃，帝令于朝堂斩之(《册府元龟》卷一五二)。思恭临刑告变，免死除名，配流梧州(《封氏闻见记》卷三)。死于岭表。

元思敬，《旧唐书》有传，其生平如次：思敬，总章中为协律郎，预修《芳林要览》。

2. 文馆词林一千卷(残)

《旧唐书·经籍志下·总集》：“《文馆词林》一千卷，许敬宗撰。”《新唐书·艺文志·总集》：“《文馆辞林》一千卷，许敬宗、刘伯庄等撰。”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类书类》：“《文馆词林》。”^①《通志·艺文略第八·总集》：“《文馆词林》一千卷，许敬宗集。”此书选本有：《崇文总目·总集类》：“《文馆词林弹事》四卷，阙。”^②《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杂传记类》著录：“许敬宗《文馆词林文人传》一百卷。”《通志·艺文略第八·总集表章类》著录：“《文馆词林弹事》四卷，唐许敬宗集晋宋齐梁以来者，旧有千卷。”《通志·艺文略第八·总集策类》著录：“《文馆词林策》二十卷，崔元暉训注。”《宋史·艺文八·总集类》著录：“许恭宗《文馆词林诗》一卷。”^③

宋王溥《唐会要·修撰》(《唐会要》以下简称《会要》)：“显庆三年十月二日，许

① 本文所引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均出清海山仙馆丛书本，此下不再出注。

② 本文所引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均出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下不再出注。

③ 本文所引《宋史·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排印本，此下不再出注。